

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之定性与定量分析

吴海波

(江西中医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04)

摘要:在清代,盐业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盐业的发展状况,不仅事关商资民食,而且还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密切相关。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盐区之一,两淮在全国十大盐区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淮盐业的重要性,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均毋庸置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浩繁的史料记载彰显了两淮盐业的特殊地位;从定量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产销量最多、行销范围最广和课税最重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两淮盐业;清代;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K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3)02-0042-06

在我国传统社会,盐业是一个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行业。有关盐业的重要性,早在唐代就有“天下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1]记载。应该说上述记载只是谈到了盐业重要性的一个方面,即作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盐对于解决老百姓的食盐与健康问题,也起着任何其他物品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盐业具有如此重要之作用,因此,长期以来,盐业一直为官府所重视;为了能更好的经营盐业,围绕盐业生产、经营、管理、销售以及其他与“盐利”相关的问题,官府内部的各级官员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与争论,可谓“史不绝书”;而由此遗留下来的各种相关记载,也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的盐业史料当中,有关清代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尤为突出。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清代两淮盐业要么复杂难解,要么举足轻重,要么兼而有之。两者当中到底孰重孰轻?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探讨该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就盐的广泛用途做一简单的介绍,以此来说明探寻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价值所在。

一、盐的广泛用途与盐的重要性

在工商业税收日益发达的今天,人民恐怕早已经淡忘了盐的重要性;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盐”充其量只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和营养品。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它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而言,盐的用途都十分广泛。

就其自然属性而言,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密歇根州一家名为“菱形晶体盐公司”的企业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罗列出了盐的 101 种用途,这其中包括清洁竹制家具、去除衣服上的污点、扑灭火焰、治病疗伤、除锈、保鲜等^[2]。实际上盐的用途还远不止这些,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至少已达 14000 余种,而且它的新用途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概括而言,其用途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食用、渔业用、农业用、工业用、药用以及国防化学之应用等^[3]。

就其社会属性而言,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远的不说,仅在我国传统社会,盐就被人民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它作为调味品、营养品或是工农业用品的自然属性所在。在我国传统社会,由于统治

收稿日期:2013-03-2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课题(YWHZ12-01)

作者简介:吴海波(1972-),男,江西高安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

网络出版时间:2013-04-02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30402.1034.002.html>

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把盐税收当作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①，因此，不知不觉中盐就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宗教等等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自不必多言，就其与科技、文化的关系而言，因为产盐而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因为盐商的慷慨解囊而带来的文化变迁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明清两代，盐在科技、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似乎更为明显^②；而就盐与宗教的关系来讲，在古代社会，盐通常被人民赋予了诸多神秘的色彩^③。此外，公元9至17世纪，盐在我国的某些地方还一度被当作货币用于生产和流通^④。

在中国，盐曾经被人民赋予了如此之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价值和意义，在国外又何尝不是如此^⑤。正如心里学家厄内斯特·琼斯所言，“古往今来，盐一直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荷马把盐称为‘神来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极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如今注意到它在宗教仪式、缔结盟约和行使咒语时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情况应该一直如此，这表明它是人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习俗、环境或者概念”^⑥。

由此可见，盐因为其广泛用途而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可谓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不过，对于我国传统社会而言，盐的重要性主要还是体现在盐课的重要性方面。以清代两淮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两淮盐区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以详细解读。

二、对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定性分析

清代两淮盐业的重要性，从定性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相关史料的浩繁上。有关两淮盐业问题，无论是在专门性盐务史料，还是在正史、别史、档案、奏折、方志当中；无论是在某些文集、诗歌、笔记、小说，还是野史、族谱当中，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相关记载。以专门性盐务史料为例，清代仅官修《两淮盐法志》就曾经有过五个不同的版本，它们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编修的《两淮盐法志》^⑦，其他盐区的盐法志是不曾有过如此待遇的。清政府如此反反复复的组织人手编修《两淮盐法志》，就足以说明两淮盐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两淮盐法志》以外，地方政府或是民间也刊印了不少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专门性盐务史料，如：《淮鹺备要》、《两淮盐法撰要》、《淮盐纪要》、《淮北票盐志略》、《淮北票盐续略》、《淮南盐法纪略》、《两淮鹺务考略》、《两淮案牍钞存》，

等等。而在《盐法通志》、《清盐法志》、《盐政备览》、《盐政辞典》、《盐法议略》、《中国盐政实录》、《中国盐政纪要》、《盐法纲要》等一些综合性盐务史料当中，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通常也要多于有关其他盐区盐业问题的记载。

再以正史、别史、档案、奏折、方志为例，与其他盐区相比，我们也会发现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史料记载要明显多于其他盐区。无论是在《四库全书》、《清实录》、《清史稿》、《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会典》当中，还是在《朱批奏折》、《刑科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当中，我们都能轻而易举的找到大量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相比于其他盐区而言，无论如何这都可以算是一个特例。

至于文集、诗歌、笔记、小说、野史、族谱当中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之丰富，同样也不必多言。以文集为例，像《包世臣全集》、《陶澍集》、《曾国藩全集》、《林则徐全集》、《吴文节公（文裕）遗集》、《陆文节公（建瀛）奏议》、《张謇集》等都有大量相关问题的记载。

总之，有关两淮盐业问题的记载之多，可谓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为数众多的史料当中曾多次出现有关两淮盐业重要性的相关言论，下面不妨略举一二。

首先仅嘉庆《两淮盐法志》当中，就至少在四处出现过有关两淮盐业重要性的记载。第一处出现在“序”当中：“伏念我国家列圣相承……而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⑧序。第二处出现在卷五十四《杂志·碑训》当中，刘宏宇在《侍御谢公盐掣记》中指出：“我国家以盐筦为利，筹用经也，其盐课之盛，无过两淮矣”^⑨（卷五十四杂志·碑训）。第三处出现在卷五十四《碑刻上》当中：“天下六运河，惟两淮运司为雄，治莅三分司，惟泰州分司为最，而安丰又泰州之钜场也。商灶渊藪，盐利甲东南之富，我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⑩（卷五十四碑刻上）。第四处出现在卷五十五《盐院题名碑记》当中，即乾隆时巡盐御史李发元云：“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⑪（卷五十五碑刻下·盐院题名碑记）。歙县《汪氏谱乘·奉宸苑卿汪君事实》当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两淮盐筦运课所入甲天下，凡转饷、卷赈、兴工、动关国计”^⑫（卷五十五碑刻下·盐院题名碑记）。

道光朝名称包世臣亦曾指出：“两淮场之广，草之丰，卤之厚，皆甲天下”^⑬。清代中晚期，两淮盐业的重要地位虽然有所削弱，但其重要性依然为其他盐区所无可比拟。正如清末赵滨彦辑《两淮案牍钞存》所言：“两淮盐为东南财赋第一大宗，举凡京协要饷，新旧洋款，取给于此者不下七八百万之巨。当此财用匱竭之

时,筹款最为要政”^[7]卷一·吕四垣盐案钞。

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兹不一一列举。即使仅凭上述记载,以足以说明两淮盐业的重要性了。这是就定性而言,如果再做定量分析,其重要性更是一目了然。

三、对清代两淮盐业重要性的定量分析

清代两淮盐业的重要性,从定量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十一大盐区当中,两淮产销量最大、行销范围最广;第二,同样也是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两淮所承担的课税最重。仅凭这二者就足以让我们相信,两淮在清代国民经济当中,有着任何其他盐区都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就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做具体分析。

1. 两淮产销量最大、行销范围最广

首先,两淮盐产区,东临黄海,西连运河,南北广袤数百里,辖盐场二三十处^⑦,皆可煮海产盐,造价低廉而产量极丰,因此,自古以来,两淮就是全国产量最大、销路最广的一大盐区。两淮盐区的这种独特地位,时至清代得以进一步稳固。

两淮是全国各大盐区当中,产盐量最大的一个盐区。据有关资料记载,两淮所辖二十三盐场每年产盐量,顺治年间大约为95-100万引之间^⑧卷上·场灶产盐第一,而当时全国的盐产量大约为370万引,两淮产量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强。康熙年间,两淮盐产量基本上保持了120万引以上的生产水平,当时全国的盐产量大约维持在400-510万引之间^⑨27,因此两淮占全国盐产量四分之一强的水平没有多少变化。乾隆以后两淮盐产量则基本上固定在160万引以上^⑩。乾隆初期,全国官盐总产量为650余万引,两淮盐产量依然占全国官盐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强;乾隆以后,除河东、长芦增产,两广不变以外,其他盐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而两淮的产量则保持在180余万引以上,因此,其比例进一步增大^⑪。我们通过各盐区行盐引数对照表也能窥其一斑。详情见表1。

上述情况是就“行盐”情况而言,而事实上两淮实际产盐量通常要高于行盐数额,这种情况在清中叶更为明显。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淮实际产盐量为1,884,026引,道光三年(1823年)为1,861,100引,道光四年(1824年)为1,819,764引,道光九年为1,997,612引^⑫43,均要比行盐数额1,802,408引要高。当然,并不排除行盐数额(相当于额产数额)也有多于实际产盐量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两淮产区出现这种情况时,其他产区也不例外,因此,两淮在全国

表1 清代各盐区行盐引数对照表

盐区名	雍乾以前每年额行引数	乾隆以后每年额行引数
长芦	正引:966,046引	正引:662497引
山东	正引:500,500引;票引:171,240张	正引:400,500引;票引:171,240张
河东	正引:426,947引	正引:635,839引
两淮	纲食引1,824,669引	纲食引1,802,408引 ^⑩
两浙	正引:704,699引;票引:100,698张	正引:472,517引
福建	正引:545,612引;溢引:387,423引	正引:347,746引;溢引:85,672引
两广	正引:605,082引;改引:209,457引	正引:605,082引;改引:209,457引
四川	水引:28,833引;陆引:131,288	水引:30,187;陆引:138,229
云南	引纸:123,687引	
陕甘	正引:12,088引	
总计	6 718 269引	

资料来源: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上册,第三篇《运销·行盐》,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1920年),第1-2页。食盐产量当中所占四分之一左右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两淮盐产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产量最大的两淮盐区,同时也是销路最广的一个盐区。两淮食盐销路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两淮官盐行销范围覆盖面广。两淮官盐行销范围,覆盖了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在内的大多数地区,具体而言,包括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在内的200余府、县。另一方面是指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以两淮官盐为销售对象的人口比例最多。我们不妨分别以有确切人口数据记载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两淮六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表

项目 时间	两淮六省人口 总数	全国人口总数	两淮六省人口占 全国人口比例
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	138 472 718	279 717 496	49.5%
嘉庆二十四年 (1819年)	169 033 469	301 260 545	56.1%
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176 885 978	412 986 649	42.8%

资料来源: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4、1075、1144、1145、1148页。

该表格清晰地表明,六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六省人口并非全部官食淮盐。事实上只有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四省大部分人口以官食淮盐为主^⑬,江苏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官食淮盐,河南则更少,大概仅为20%左右。但如果综合起来看,在两淮六省人口当中,官食淮盐的人

口数还是要占大多数。据笔者初步估算,其比例大约为65%。由此可以推算出,两淮六省官食淮盐的人口总数大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2.5%(50%×65%)左右。也就是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以官食淮盐为主,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官食淮盐的人口总数之多,确实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2. 两淮盐区承担课税最重

产量最大、销路最广的两淮盐区,同时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立国的“财赋之源”^[14]。因此,在清代全国各盐区当中,两淮承担的课税也最重。清代两淮盐业的重要性,相当程度上正是体现在两淮课税的重要性方面。

两淮盐课的重要性,并非源于清代,事实上早在西汉时代就有记载。据雍正刊《扬州府志》载:“吴王濞封广陵,煮海为盐,国无赋而用饶,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之始”^[15]卷十八盐法。唐宋以后,两淮盐课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据《宋史》食货志云:“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宴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佑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此唐举天上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16]时至清代,两淮盐课在国家赋税收入当中所占比重更是有增无减

在清代,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包括三大块,即田赋、盐税和关税。其中田赋最多,有清一代,基本上维持在赋税总额的60%以上,清初,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87%;盐税比重为次,大约占9-18%之间,清初比重相对较低,但自康熙朝清代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赋税政策后,地丁税的征收数额相对被固定下来,难以

大幅度增长。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政府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盐课等其他税收,盐税比重因此日益增加。关税是清政府第三大税收来源,总体而言,其比重相对较少,乾隆以前,其比重基本维持在4%左右,直到乾隆三十一年才突破10%的比例。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杂税。具体情况见表3。

那么,在国家所有的盐课当中,两淮盐课占了多大的比重呢?相关史料并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不过透过清人的言论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个大概。如清人李果说:“两淮盐课甲天下”^[17]卷十一;两淮盐政陶澍说得更具体:“东南财赋,淮漕为最大,天下盐务,淮课为重。即如各省地丁钱粮,或数十万,或百余万。极重如江苏,亦只三百万。而两淮盐内外正杂支款,岁需七八百万,足以抵数省之钱粮”^[18]227。不过仅从上述言论而言,还是不足以判断两淮盐课在全国盐课当中所占具体比重。虽然陶澍提到“两淮盐内外正杂支款,岁需七八百万”,但这七八百万并非都是盐课,其中还包括了部分杂项在内。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找到某一年份两淮盐课的确切记载来推断。如据有关资料记载,顺治初年,清政府向两淮盐商“征课银56万两有奇”^[19]卷81.食货志。如果以国家全年盐课为87万引计,那么两淮所占比重应该为64.3%。再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例,内地八个盐区(不算奉天、甘肃,也不算四川、云南及陕西部分地区的票盐)岁额课银3,882,000余两,其中两淮课银2,039,000余两,占全国比重的一半还多(52.53%)^[20]269-270。如果说两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数年的情况也许能给予我们更详细的答案,具体情况见表4。

表3 鸦片战争前清朝税收结构比较表

单位:万两

时 间	地丁		盐课		关税		杂税		总 额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顺治九年(1652)	2126	87.2	212	9	100	4.1	/	/	2438
康熙二十四年(1685)	2823	82.4	388	11.3	122	3.6	91	2.7	3424
雍正二年(1725)	3028	83.0	387	10.6	135	3.7	99	2.7	3649
乾隆十八年(1753年)	2964	69.5	701	16.4	459	10.0	142	3.3	4266
乾隆三十一年(1766)	2991	70.3	574	13.5	540	12.7	149	3.5	4254
嘉庆十七年(1812)	2802	69.8	580	14.4	481	12.0	151	3.8	4014
道光十九年(1839年)	2943	71	747	18.1	435	11	/	/	4125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锋:《清代财经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由此可见,两淮盐课所占全国盐课比重,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间。一个产量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的盐区,每年却必须向国家缴纳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赋税,其负担之重,可谓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国

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是天灾年荒、河防工需、巡幸典庆等,两淮盐区都得捐输报效,有清一代,两淮的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仅乾嘉年间的捐输量就多达近3000万两^[21]卷153·杂志门一·捐输。

表4 两淮与全国税课岁入比较表

时 间	两淮岁入(两)	全国岁入(两)	淮课所占比例%
顺治 10 年(1653 年)	1 197 090	2 128 016	56.3
顺治 14 年(1657 年)	1 360 602	2 520 646	54
顺治 15 年(1658 年)	787 975	2 516 989	31.3
康熙 3 年(1664 年)	1 786 791	2 743 675	64.5
康熙 12 年(1673 年)	1 446 552	2 792 705	51.8
乾隆 8 年(1743 年)	2 568 348	5 560 540	46.2 ^②
嘉庆 8 年(1803 年)	2 308 197	5 652 575	40.8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

总之,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两淮是食盐产销最大的一个盐区,同时,更是赋税负担最重的一个盐区。

四、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而言,两淮盐区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其实只是分析了盐价值的一个方面;而盐的功效,体现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本文所指,主要是针对其社会属性而言,即盐税作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所体现的价值,它已不仅仅是调味品或营养品,而是被政府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从而演变成了国家获取供赋的一个载体。盐如果一旦脱离了载体,就不可能会被人们抬到如此高的地步。当今事实表明,当盐税的重要性退出历史舞台时,除了作为调味品或营养品这一自然属性外,盐的其他功效通常会被人们所忽视。

注释:

①中国盐税的渊源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与此相关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禹贡》。《尚书·禹贡》中有青州“厥贡盐絺”的记载,就是说青州“贡”给奴隶主国家的贡物有盐和絺(一种细葛布),但此时的“贡盐”还不具备税收的性质。商、周时代基本上沿袭了夏朝的做法,盐业收入仍未被当作税收来征收。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春秋中期,齐恒公利用管仲之策,率先实行盐专卖制,从此盐开始为政府所垄断,而盐税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财税来源之一(参见马克·科尔兰斯基著,夏业良、丁伶青译《盐》,第281-284页)。春秋以后,其他各朝皆然。尤其到了唐宋以后,盐税在整个国家财税收入当中所占比重可谓越来越大。最初我们在唐代有关史料中能看到有关盐税占国家全部税收之半的记载,一直到清代,这种局面都没有多大改变。而事实上

“盐税占国家全部税收之半”的说法恐怕并不是一个延续不变的现象,它可能只是在某一个朝代的某一段时间存在。有关这一点本文在后文将有详细的阐述。

②比如在清代,拥有巨额资产的扬州盐商(又称两淮盐商),就曾对扬州的书院建设、园林建设、市镇建设、民俗风情、饮食服饰、戏曲繁荣等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比如王振忠的《明清徽州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王瑜、朱正海主编的《盐商与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朱宙宙的《清代扬州盐商与戏曲》(《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伟康的《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郑志良的《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蔡春浩的《明清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黄炜炜的《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5年第2期)以及黄傲成、汪崇箕、宋良曦、陈然、曾凡英、杨贤宗、于海根等学者的相关论文,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

③马克·科尔兰斯基在其著作《盐》的引言中提到,在传统的日本戏院里,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在舞台上撒盐,以保护演员不受邪恶精灵或鬼怪的伤害。在海地,人们认为打破咒符,使举止怪异者恢复正常的惟一方式就是利用盐的魔力。在加勒比海黑人的文化中,盐打破符咒的能力不只是局限于邪恶精灵或鬼怪,他们同时还认为盐会驱逐所有的精灵。而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盐能够驱赶邪恶的眼睛。陈然、曾凡英在《盐,一种文化现象》一文中也提到,在我国的盐都自流井地区,因盐场用牛众多,每年逢牛王诞辰之日,便举行盛大庆典和祭祀活动,称之为“牛王会”。参见彭泽益、王仁远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

④公元9世纪至17世纪,在云南的丽江、永昌、建都、普洱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都曾出现过盐币。盐币是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并以官方掌握的印记控制盐币形状与重量,固有其价值,如同货币发行一样由官方严格管理。甚至到20世纪中期,云南的裸黑山还有盐币的存在。有关云南盐币的具体情况可参阅董咸庆的《盐币:云南市场流通过的货币》(彭泽益、王仁远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9-556页)和赵小平的《清代滇盐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缪坤和主编:《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243-252页)二文。上述二文就云南盐币的产生、发展、流通、形态、功能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⑤埃及人制造木乃伊是使用盐来防腐;对于古希伯来人以及现代犹太人来说,盐是上帝与以色列缔结盟约的永恒象征;而在伊斯兰教徒看来,若能用盐来封存契约,其本质将永远不会改变。

⑥康熙《两淮盐法志》,由崔华、谢开宠等人纂修,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雍正《两淮盐法志》,由两淮巡盐御

史噶尔泰纂辑,成书于雍正六年(1728年);乾隆《两淮盐法志》,由两淮盐政吉庆等奏准重修,王世球等人编纂,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嘉庆《两淮盐法志》,两淮盐政信山奏准重修,单渠、沈襄琴等编纂,成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光绪《两淮盐法志》,由王定安、朱孔彰等编纂,成稿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过校定修改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刊行。

⑦清承明制,清初与明代一样,两淮共有盐场三十所,分别是丰利、掘港、石港、马塘场、金沙、西亭、吕四、余西、余中、余东、角斜、拼茶、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场、刘庄、伍佑、新兴、庙湾、板浦、徐渎、临洪、兴庄、莞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30所盐场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康熙十七年(1678年),将徐渎场并入杨浦场;雍正五年(1727年),将临洪、兴庄2场合并设立临兴场;乾隆元年(1736年),在淮北设立中正场,且将浣渎场并入,在淮南则将马塘场并入石港场,余中场并入余西场,白驹场并入草堰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西亭场并入金沙场,小海场并入丁溪场。经过康、雍、乾三代的调整,共裁并了9场,新设2场,故有清一代,两淮盐业的三个分司,共辖23盐场。只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淮南盐场不敷,故在淮北增辟新海滩产盐,但到民国元年(1912年),方正式设立济南场,故不能将其计入清代盐场之列。

⑧这是就官盐而言,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私盐无法进行统计,因此,一百六十多万引官盐并非两淮每年产盐量的全部。

⑨由于缺乏云南、陕甘两盐区的具体数据,因此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云南、陕甘的产盐量在乾隆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⑩上元等8县归纲138,847引,系带课不行盐,因此两淮实际行盐为1,680,000余引。

⑪据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其中湖南、湖北大概有

90%以上的人口以官食淮盐为主,江西、安徽的相关比例为75%。

⑫王做成的统计与陈锋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出入,据王做成考证,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每年上缴的盐课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参见王做成:《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马克·科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 [3] 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 [4] 嘉庆.两淮盐法志.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本.
- [5]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
- [6] 包世臣.包世臣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3.
- [7] 赵滨彦.两淮案牍钞存.光绪朝铅印本.
- [8] 陈庆年.两淮盐法撰要.民国年间益智社铅印本.
- [9]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0] 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 [11] 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J].江海学刊,1962,(11):36-41.
- [12] 尹会一,程梦星.(雍正)扬州府志[M].扬州:成文出版社,1974.
- [13] 脱脱,等.宋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李果.在亭丛稿.乾隆十年(1745年)刻本.
- [15] 陶澍.陶澍集:上[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6] 黄之隽.江南通志[M].北京:京华书局,1967.
- [17] 吴慧,李明明.中国盐法史[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
- [18] 盐务署辑.清盐法志.1920年铅印本.

责任编辑:梁雁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and Huaibei

WU Hai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alt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on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e stand or fall of salt industry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business capital and the food of the citizen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assignment of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A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salt zone, the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and Huaibei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leven salt production areas. Both from the viewpoint of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 regions is undoubtedly. From the qualitative point of view, the numerous historical records reveal the special status of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and Huaibei. From the quantitative point of view, its significa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ost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most sales volume, widest market and heaviest tax and so on.

Key words: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and Huaibei; the Qing Dynasty; qualitative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